

习近平总书记所作的比喻

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的

母版、模板、再版、翻版

□刘媛乌云娜

2018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指出，“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

“母版”指预先设计好的版式，“模板”指固定化的版式，“再版”强调二次印刷，“翻版”强调直接复制。习近平总书记用这四种比喻的否定用法，生动形象地指出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之所以令人瞩目，就在于中国拒绝照搬照抄，坚持从自身实际出发，走出了一条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这条道路具有鲜明的中国

特色。

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历史文化的赓续创新，不是简单延续历史文化的母版。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下取得的，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但传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并未割裂与中国历史文化的联系，正因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马克思主义更能切合中国实际、符合人民需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一次又一次的历史性飞跃，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作风，进而生发推动社会变革的巨大力量。

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统一的结果，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是共性与个性的结合。一方面，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遵循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我们在波澜壮阔的社会改革中始终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充分彰显了社会主义的共性要求。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精神养分，通过实践检验形成中国经验，赋予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以新的生机与活力，不断开辟社会主义发展新境界。

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模式的重复，不是一种再版，而是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改革与超越，是继承与发展的结合。苏联探索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创立初期，高度集中、过分集权的模式对国家建设起过积极作用，但国家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经济上的高度集中、政治上的过分集权、文化上的垄断专制、对外大国主义终使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以失败而告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继承了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取得的积极成果，批判吸收了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浪潮中不断进行改革与自我完善，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

中国所走的现代化道路与国外现代化国家所走的道路有明显不同，不是照搬照抄等生硬模仿的翻版行为，而是具有鲜明原创性和独特性、可为世界提供借鉴与智慧的中国方案，是科学与创新的结合。由于各国国情、历史文化不同，走向现代化的时机选择、道路设计和制度安排也各不相同，每个国家都有选择自己发展现代化的方式的权利。中国式现代化扎根中国大地，既切合中国实际，体现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也体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独立自主迈向现代化树立了典范，也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选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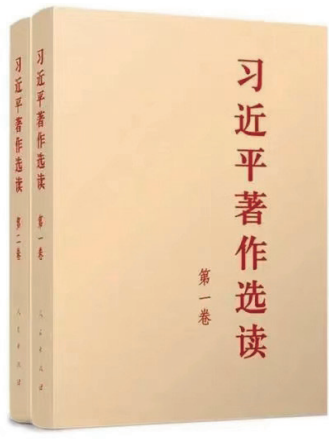
关系亲不亲，关键在民心

——读习近平总书记《坚持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

□祁怀高

习近平著作选读

重读经典



周边是我国安身立命之所、发展繁荣之基。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周边外交。《坚持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10月24日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讲话的要点，收录在《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这篇重要文献深刻阐述了中国周边外交方针，系统提出了亲诚惠容周边外交理念。“亲”体现在亲仁善邻、“诚”体现在以诚相待、“惠”体现在互惠互利、“容”体现在开放包容。亲诚惠容周边外交理念既是对过去“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睦邻、安邻、富邻”周边外交理念的继承与发展，又是新时代中国周边外交理念的重要创新，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提供了中国方案。

推动周边睦邻友好

发展同周边国家睦邻友好关系是我国周边外交的一贯方针。

在这篇重要文献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睦邻友好，守望相助”“多做得人心、暖人心的事，使周边国家对我们更友善、更亲近、更认同、更支持，增强亲和力、感召力、影响力”“要诚心诚意对待周边国家，争取更多朋友和伙伴”。“亲”和“诚”这种带有情感性的表达体现了我国与周边国家间友好关系的情感升华。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全面深化了同周边国家关系，已同周边28国和东盟建立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的伙伴关系、合作关系或战略互惠关系。我国同巴基斯坦、老挝、柬埔寨、缅甸等周边国家达成构建命运共同体共识，同湄公河五国确定共建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同中亚五国宣布打造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在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进程中走在世界前列。我国与朝鲜、越南、老挝等社会主义邻国之间的传统友谊焕发生机。我国同柬埔寨、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等传统友好邻国深化了彼此互信，巩固了相互支持。我国同印度、韩国、蒙古等邻国改善了关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关系亲不亲，关键在民心”。加强对周边国家的人文交流有力增进了我国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全方位推进人文交流，深入开展旅游、科教、地方合作等友好交往，广交朋友、广结善缘。以中国与东盟各国人文交流为例，迄今双方互派留学生人数超过20万人，42所孔子学院和39个孔子课堂在东盟国家落地。2024“中国—东盟人文交流年”全年将共同举办200多项活动，形成中国东盟20多亿民众互动交流交往新热潮。

守望周边和平稳定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提出亚洲安全观，努力走出一条共建、共享、共赢的亚洲安全之

路。习近平总书记在这篇重要文献中指出，要“推进同周边国家的安全合作，主动参与区域和次区域安全合作，深化有关合作机制，增进战略互信”。在2014年5月的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简称“亚信”）第四次峰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应该积极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推动亚信成为覆盖全亚洲的安全对话合作平台，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建立地区安全合作新架构”。习近平总书记阐述的亚洲安全观汇聚了地区国家的智慧和共识，为亚洲安全合作开辟了新的广阔前景。

新时代，我国周边外交更加积极地参与周边热点问题的解决，营造了总体稳定的周边环境。在朝鲜半岛问题上，我国着眼维护半岛和平稳定并实现长治久安，创造性提出“双暂停”倡议和“双轨并进”思路。在阿富汗问题上，我国搭建阿富汗邻国协调合作机制，重启中阿巴三方外长对话，提出帮助阿富汗重建发展的《屯溪倡议》。在缅甸问题上，我国促推各方弥合分歧，恢复国家社会稳定，尽快启动政治对话。我国参与解决周边热点问题有着鲜明的中国特色，即和平性、正当性和建设性。和平性就是坚持政治解决方向，主张通过对话谈判解决任何矛盾分歧，坚决反对使用武力；正当性就是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尊重当事国的主权和意愿，坚决反对强加于人；建设性就是坚持客观公正立场，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开展斡旋调停，坚决反对对谋取私利。

引领周边发展繁荣

我国着力深化互利共赢格局，引领周边国家发展繁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本着互惠互利的原则同周边国家开展合作，编织更加紧密的共同利益网络，把双方利益融合提升到更高

水平，让周边国家得益于我国发展，使我国也从周边国家共同发展中获得裨益和助力”“要倡导包容的思想，强调亚太之大容得下大家共同发展，以更加开放的胸襟和更加积极的态度促进地区合作”。“惠”强调的是互惠，而不只是我国一方的发展惠及周边国家，周边国家的发展同样也可以惠及中国，互惠体现我国对发展周边关系的一种均衡态度。“容”强调的是包容，即发展的包容性，这既是中国倡导的地区合作乃至全球治理理念，也是对个别大国意图在本地区建立一种排他性体系的回应。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同相关国家共同努力，加快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好丝绸之路经济带、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10多年来，“一带一路”合作从亚欧大陆延伸到非洲和拉美，我国已与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了230多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首要合作伙伴是周边国家，首要受益对象也是周边国家。中老铁路、中巴经济走廊、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中马“两国双园”、中国印尼雅万高铁等一大批合作项目加快了区域增长。我国以周边为基础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扩大贸易、投资合作空间，构建区域经济一体化新格局。当前，我国已成为周边大多数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最大出口市场和重要投资来源地。

今天的亚洲，置身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站在迈向发展振兴的新起点。我国周边外交的使命是努力使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政治关系更加友好、安全合作更加深化、经济纽带更加牢固。展望未来，亲诚惠容周边外交理念将继续指引中国周边外交的前行方向，为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和美好亚洲家园作出更大贡献。

美国战地记者笔下的“延安信仰”

——读乔伊·荷马《在中国看见曙光》

□王雪楠

1938年12月，美国“各教派教会对华救济委员会”派出的记者乔伊·荷马到达中国，跟随美国卫理公会医疗传教士罗伯特·布朗领导的医疗调查小组，从温州港入金华，一路穿越烽火线，造访多个城市，最终于1939年夏季抵达延安。1941年，她将这次中国之旅写成《在中国看见曙光》。身为基督徒、医疗调查组成员、战地记者，荷马的三重身份使其观察视角别具一格。

年轻的共产党人“不光年纪小，思想也很先进”

赴中国采访前，荷马已对有关中国共产党的报道有所了解，很多报道上将他们形容为“现政府的反对者”“蒋介石未能清剿的敌人”等等。可是，当荷马采访卫立煌、阎锡山等“剿共”将领时，却惊讶地发现，卫、阎麾下不仅有很多共产党员，二人更是对这些青年赞不绝口。实际上，1936年底至1939年初，党中央设立洛阳八路军办事处，通过游击战、根据地、统一战线来坚持华北抗战的构想已逐步落地。奋斗在最前线的，正是一群年轻的共产党人。

1937年4月，赵荣声等燕京大学学生循着埃德加·斯诺给的路线图赴延安考察，随后加入西北战地服务团并秘密入党。1938年初，卫立煌造访延安，主动提出要学习八路军军政工经验，还请“安徽小同乡”赵荣声到战区总司令部任秘书。八路军如何做到“打不散，打不垮”？朱德曾告诉卫立煌“讲政工，有群众”。于是，卫立煌经常要与赵荣声进行探讨，“关起门来研究八路”。他在二战区总司令部驻地，按八路军办法组织了“战地工作团”，带着国民党士兵搞内务、贴标语、挂地图，每天下午5点全体官兵

一起高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战地工作团给基层军官搞培训，直接用隐去作者姓名的《论持久战》。

那些战地工作团成员，实际都是延安总政治部、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选派的“陕公”“鲁艺”“抗大”毕业生。之后，卫立煌部与日军在中条山尾段垣曲县反复拉锯，战后恢复秩序、稳定民心的工作也交给了工作团。他们以3—7人的小队出动，遍贴告示、搞流动宣传；召开座谈会，让卫立煌与本地百姓面对面谈话，告知以军队抗战、不扰民、扰民可举报的纪律；展示战利品和战地照片，搞群众大联欢。一个月后，数百个跑进山里的青壮年回了家，乡亲们通过新建的交通线，随时可知晓日军到了哪里，人心稳了，后方大了，前线作战也更加顺利。1939年3月荷马到达卫立煌洛阳驻地时，工作团已在重庆的压力下解散。但是，卫立煌仍与共产党军队保持着联系，他对荷马坦言，自己很喜欢这些共产党员。他赞成共产党的作战判断：日军即便能渡过黄河，也注定打不赢这场“没有后方、没有民众支持的战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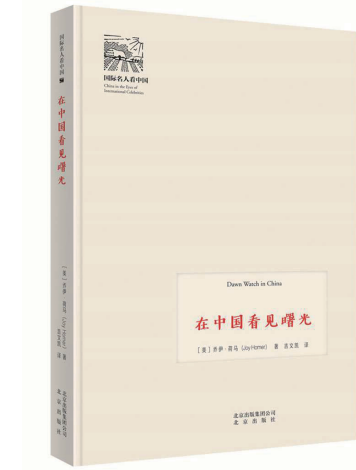
1939年5月，荷马见到了阎锡山。阎锡山笑称“我的部下接受的是北方共产主义者的训练，个个训练有素”。荷马也发现，在“阎锡山的地盘”，身穿褪色八路军军装的共产主义战士，“是这个营地里众星捧月的明

星”。她评价这些人：“不光年纪小，思想也很先进。”

“共产党的地盘上，医护人员却惊人的充足”

作为国民政府委派的医疗调查小组，荷马一行肩负着考察汇总各地医疗需求的任务。一路走来，大多是缺医少药、流行病肆虐、外科医生极度缺乏的情形。可当她走入延安中央医院时，眼前的景象大不相同：“一间间崭新的病房、实验室、手术室，里面还配备有X光仪器”。这让荷马非常好奇，为什么“共产党的地盘上，医护人员却惊人的充足”？其实，1937年中央进驻延安后，医疗机构缺人、缺药、缺钱的情况非常严重，国民政府还刻意遍设关卡，对边区实施医药封锁。面对如此严峻的局面，一条“团结中西医，国际合作医疗”之路在摸索中成型。

当时，延安中央医院负责摸底调查、组建中西医联合团队。他们遍邀华北老中医到中央医院坐诊，在西医治疗中主动增加中医药防病治病，然后大量总结土方、偏方使用经验下整个边区。对旧医生群体，边区政府采取教育方法，争取他们与政府的合作。与此同时，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协调下，马海德、白求恩、柯棣华等



乔伊·荷马著《在中国看见曙光》

带领的外籍医疗团队陆续来到延安。他们不仅带来了一批必要的医疗设备，还带来规模化培训医护的办法，即外籍医生训练骨干医生，骨干医生“边干边教”，轮训稍有文化的革命青年，快速增加一线人员。白求恩医疗队通过“药骡子”，直接把流动医院建在前线。每个医疗队不仅有医生、护士、麻醉师，还让伤员、本地群众都参加进来组成委员会，尽量将救治、护理、医疗管理本地化，应对医疗人员不足的困难。

荷马敏锐地注意到“共产党的战地医院里有许多基督徒”。她就此直接询问毛泽东：“您允许基督徒加入党

吗？”毛泽东对她解释道，我们非常感激来延安参加医疗援助的基督徒们，“这种感激远超过了政治范畴”。基督徒与共产党员信仰不同，他们无法完全认同“我们所追求的道路”，但是他们却是我们团体内尊贵的成员”。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克服困难”

荷马坦言，此前她一直认为“一般的共产党群体，就是一些理想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短短数日的延安之行，却让她无比清晰地体会了什么是“延安信仰”。

在延安，八路军接待委员会的青年告诉荷马，他和同学走了一千多里奔赴延安，到这里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想”。在抗日军政大学的“窑洞宿舍”，学员们向荷马耐心讲解墙上的标语，憧憬着毕业奔赴前线的情形。

1938年1月起，国民政府开始向八路军提供军饷，可每月50万之数只能养活4.5万人。1938年底，八路军已发展至16万人，国民政府却仍按原数发给。面对边区出现的经济困难，以及针对分散生存的农村经济，边区政府一面领导春耕运动，一面推行减租减息。上到八十，下到八岁，都知道“一颗粮食，一线生命；一颗粮食，一份抗战力量”，积极投入劳动，向大自

然要地、要粮、要棉。1939年2月，全党继续开展大生产动员，“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克服困难”成为每个共产党员的生活准则。

在鲁迅艺术学院，荷马非常好奇“在全中国最关心战争的地方”，人们到底怎么搞艺术。荷马见到了任教的洗星海夫妇，感叹从巴黎学成归国的艺术家，在灰扑扑的窑洞里，竟能将中西音乐融为一体，“既很好地遵循了西方音乐的形式与和弦，又将其与那难以名状的东方旋律融合在一起”。全面抗战爆发后，如洗星海夫妇这样奔赴延安的艺术家，大多经历了“怕窑洞”到“爱窑洞”的历程。洗星海向友人坦言，来延安前他总觉得窑洞“又脏又局促”，结果短短几月内，他就发现窑洞“冬暖夏凉，通风透气”的好处，而且有共同志向的师生们能随时围坐暖炉旁，边谱曲边唱和。正是在这里，洗星海写出了脍炙人口的《黄河大合唱》。

一路上与共产党人的多次接触，让荷马毫不讳言自己的赞赏：“我看到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上到党的领导人，下到年纪轻轻的战士，比起那些非共产党人，他们对于日军有着更加坚定、绝不妥协的态度和那份誓死赢得战争的决心。”然而面对国民党的绝对优势，共产党是否“凶多吉少”？结束延安之行前，荷马将这个“尖锐问题”抛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回答道：“对我们自己而言，我们必须维持团结的局面。”同时，“为了自己，我们会成为现有政府里一个规模不大但很有发言权的组织”。

